



复旦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新编第 930 期 2012 年 10 月 24 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31-0801/G

我校与甘肃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我校与甘肃省政府在兰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教育、科技等重点领域实现高层次省校互动。学校将不断优化在甘普通高考招生类别和专业结构,扩大在甘肃的招生规模,每年确定若干个甘肃发展急需的重点学科专业,接收一定比例的甘肃省属本科高校推免生到我校定向学习深造。

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在签约仪式上致辞。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我校校长杨玉良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我校常务副校长陈晓漫出席签约仪式。

在甘肃省访问期间,朱之文、杨玉良、陈晓漫率团访问了兰州大学和河西学院,并会见了甘肃校友会代表。

文 / 陶韩烁

复旦医科积极投身上海卫生事业两个“5+3”建设 软件硬件并举 服务国家医改

医学毕业生要在上海做医生,必须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才能走上临床岗位。2010 年,上海市启动了教育部批准实施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构建以临床实践能力为核心的“5+3”培养模式,即 5 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加上 3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紧密结合。这一临床医学专业高端人才培养模式今年起在全国推广应用。

而从 2009 年开始,上海启动了郊区三级综合医院建设项目,即“5+3+1”工程:市六医院在浦东临港新城、长征医院在浦东曹路镇、仁济医院在闵行浦江镇、华山医院在宝山顾村、瑞金医院在嘉定新城,分别新建三级医院;崇明、青浦、奉贤 3 个区(县)的中心医院,提升为三级医院;金山医院迁建海浜新城。我校附属华山医院、金山医院参与其中。这项工程是促进上海城乡医疗

卫生事业均衡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总体目标是通过优化三级医院设置,使郊区居民享有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提高。

上述郊区三级综合医院在“硬件”得到较大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大量人才“软件”的储备。因此,“5+3”模式培养的临床医学人才将为今后包含“5+3+1”工程在内的整个上海医疗行业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建立“5+3”模式

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科研、轻临床”的倾向,研究生的临床专业素养和临床技能难以胜任临床岗位实际需求。

2010 年,上海市正式启动临

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改革试点。在两年多的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上海“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2010-2012 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试点高校迄今已经招录了三届共计 1112 名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

我校作为首批试点发挥重要作用

我校作为全国首批开展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工作的试点单位,校领导一直高度重视这项工作。2011 年 12 月 6 日,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桂永浩参加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此后,校领导更是多次关心该项工作的实施情况,要

求参与工作的各部门人员“勇于担当,服务国家战略”,扎实推进我校各项相关工作,从而使我校在上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综合改革试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政策研究方面,自 2010 年以来,我校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汪玲作为“上海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试点项目工作小组组长,

(下转第 2 版)



管院三项目跻身全球 EMBA 百强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管理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该院三个项目跻身英国《金融时报》(FT)2012 年全球 EMBA 百强排名,这使我校管院成为中国大陆乃至大中华地区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商学院。校长杨玉良出席发布会。

据 FT 排名显示,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 EMBA 项目位列全球第 9,该项目自 2006 年参加 FT 排名以来,已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二十强,七年平均排名居中国大陆第一;复旦大学 EMBA 项目今年首次参加排名,位列第 35 名,是全球中文 EMBA 项目第 1 名;复旦大学—香港大学 IMBA 项目今年也是首次参加排名,位居第 54 位,也是全球非全日制 MBA 项目第 6 位。据悉,中英双语教学的复旦大学—香港大学 IMBA 项目毕业生薪水增幅高达 96%,位居全球第三。

《金融时报》每年的排名是全球公认的管理教育权威排名,在学生综合素质及其职业发展和学院的学术成果、研究能力、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科学的评价标准。



10 月 22 日,天津,李岚清校友(左)向获得 2012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的刘源张教授颁奖。 摄/刘畅

2012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在天津颁出 刘源张首获“终身成就奖” 中国管理学年会同时开幕

本报讯 10 月 22 日,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主办,天津大学联合承办的 2012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暨中国管理学年会开幕式在天津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杨玉良出席活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黄海军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梁樑教授,以其多年来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中所做出的卓越成就夺得了今年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他们将分获每人 50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为了表彰对中

国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开创性、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工作者,今年,基金会专门增设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成为了该奖项的首位获得者,并被授予专门制作的金质奖章。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李岚清出席活动并亲自为刘源张院士颁奖。据介绍,李岚清同志亲自篆刻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之印赠予刘源张院士,并题词祝贺刘老获奖。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当天的典礼上讲话,并为“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颁奖。

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基金会领导刘山在、王基铭、秦绍德、基金会理事及理事单位代表、获奖者所在单位负责同志,天津市和天津大学相关领导等出席活动。

文 / 卢杉 陶韩烁

要闻简报

我校与金川集团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我校与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在兰州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杨玉良出席签约仪式,常务副校长陈晓漫代表学校与金川公司签约。双方商定在矿产资源勘探、采、选技术、化学化工、冶金工艺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是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控股的国有特大型有色冶金和化工联合企业,也是全球同类企业中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

文 / 李莹

复旦“智库”建设成果 《双轮驱动》正式出版

本报讯 复旦发展研究院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从去年 5 月开始,对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开展学理性研究。这项研究成果近日以《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为题,在校出版社出版。

该项研究指出,未来十年,国家发展应该从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动发展的模式,转变为依靠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合作、共同驱动的发展模式。

文 / 任远

复旦病理研究所在 附属肿瘤医院成立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一个致力于病理转化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所——复旦大学病理研究所在我校附属肿瘤医院揭牌成立。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出席仪式。

据介绍,病理研究所今后将聚焦高发恶性肿瘤,建立与治疗预后相关的分子分型模型,加快发现靶向治疗中的新靶点。(详见 5 版)文 / 倪洪珍

欧盟经济与金融总司 司长来我校作演讲

本报讯 10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主管经济与金融事务的经济与金融总司司长马可·布提一行来访。校长杨玉良会见了来宾。

当日上午,马可·布提在经济学院做了题为“欧元:挑战与前景”的主题演讲。副校长林尚立出席并致辞。此次讲座是 10 月 10-15 日在我校举办的欧元周系列活动之一。

文 / 王一普

新任院长系主任访谈①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王晓阳： “力争达到美国计算机院系第 50 名的水平”

编者按：“十二五”期间，学校管理重心将进一步下移，以增强院系办学自主权和办学活力。院系将进一步成为提高学校综合实力的行为主体。近一年来，我校已有十多家院系、医院“换帅”。校刊自本期特设专栏“新起点·新展望”，访谈新任院长系主任，让全校教职员了解这些院系的发展规划，通过他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前景，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十二五”建设，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王晓阳：我校计算机系 1982 级校友，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主管，美国佛蒙特大学计算机系 Dorothea 冠名教授。2011 年 9 月受聘我校任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我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是个很年轻的学院，成立仅四年多。尽管学院在数据库、计算机网络、媒体计算、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系统软件、计算机理论等领域的发展有 56 年的历史也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优势，但是由于成立不久后学院领头人因故缺失等状况，学院在学校大发展的“十二五”阶段中基本处于“静悄悄等待”的状态。

所以，“如何凝聚力量，让大家明确特色研究方向，将学院整体实力带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去年 9 月上任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王晓阳教授面临的紧迫问题。

学科：确定“数据云”特色研究方向

“数据云”研究方向是未来几年计算机学院的发展方向。王晓阳介绍，现在是“数据为王”的时代。学校的各种科学研究越来越数据化，国际上也对数据驱动方面的研究比较认可。这个机遇给了我计算机学科新的发展动力。

上任后，王晓阳与在职教师面谈，尽快让全院教职员重新团结在一起。通过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民主决策的作用及全体教师参与的过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确定以云计算上的大规模数据处理为特色研究方向，并由此提出了“数据云”的概念。联合学校其他院系开展跨学科研究。学院将以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作为主攻方向。为此，计算机学院设立了先进的云计算机房。

明确方向后，计算机学院在校内外准备开展或正在进行多项跨学科研究。譬如将与生命科学学院、物理系等理科院系开展合作；文科方面，正在开展的政府绩效管理项目，用数据来考察评估政府项目，

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点关注。计算机学院还与工业企业方面开展大量合作，如桥梁监测、交通监测等。

同时，计算机学院积极服务上海、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尤其是服务国家安全。今年 6 月，计算机学院关于“安卓智能手机用户隐私泄露”的研究成果让大众对数据安全逐渐重视起来。其实，在数据安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数据安全方面的研究，我校计算机学院早已开展，近年来将其作为学院特色研究方向后，更是加强科研力量，厚积薄发。如今在数据安全方面，我校的科研实力已走在国内乃至国际前列。据介绍，学院正在研究针对移动互联网安全薄弱环节的解决方案。而且，中国银联也慕名而来，邀请我校计算机学院与经济学院合作，为银联电子支付的安全保驾护航。此外，上海“智慧城市”的打造，我校计算机学科一直在致力提供科研服务。

人才：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薪酬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

高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缺乏是学院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学校当前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自主培养的大方向下，引进人才是个紧迫的任务。计算机学院成立以来，引进人才方面也基本上是“静悄悄等待”。由于国外对计算机人才的高需求，计算机从业人员相对容易达到高收入，计算机学科在引进人才较其它学科更是个难题。

为完善人才结构，推进学科发展，今年 3 月起，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推行“年薪制岗位”（简称“年薪岗”），并面向海内外招聘人才。年薪岗实行合同年薪制。应聘者年薪值在参考市场价位下个案协商制定。年薪岗六年为一个聘期，首聘期内，学院将于第四年对受聘人员进行初期考核，初期考核合格方可进入第二个聘期。据悉，学院目前已看中了近 10 名应聘者，招聘工作正在进行，很快就应该有几位入岗者。

王晓阳介绍，计算机学院在未来的人才政策上将更看重学者在国内、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或可说是“江湖地位”。这次的人才招聘在对应聘者学术水平的考评环节将交由欧美有关权威专家评价，以确保招聘到的人才货真价实。未来五年，计算机学院计划招聘 15 人，包括 5 名教授、5 名副教授、5 名讲师。不同层级的人才都将引进，再加上内部挖潜，尽快建立拥有美国计算机院系第 50 名同等水准的人才梯队。

学生：竞赛生直升+尖子班培养

在学生培养方面，计算机学院打算一方面深挖优秀生源，一方面

结合工科特点加强人才培养。在争取优秀生源上，学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在自主招生方面开辟特殊渠道，直接从国内外计算机竞赛获奖高中生中选拔招录。首批 30 名学生明年 9 月将入校就读。

在人才培养方面，结合计算机学科作为工科偏重应用的特点，学院打算在学生培养上，借助“珠峰计划”的实施，加强与微软亚洲研究院、IBM 等国际著名计算机企业之间的合作。最近，学院开始着手筹备尖子班建设，预计于明年启动。今年 9 月份，学院主持的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成为“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将借着这股东风把人才培养做实做好。

“像 MIT 计算机学科一样注重产业应用、社会影响力”

我校计算机学科有着 56 年历史，学科基础很扎实。王晓阳自己就是 82 级系友，回忆起当年的学科水平，对比现今学院在国内的学术地位，他感怀颇深。他表示，计算机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还处于艰苦创业阶段，要迎头赶上国际一流的计算机院系，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既缺资金，也缺政策。他非常认可学校最近发布的高级职称评定办法，注重代表成果及学术影响力，并把具体评价方法放权给学院。他希望，学院能在教师薪酬教师职称名额、博硕导师名额及认定办法，在与政府企业合作，在研究生培养，尤其是专业硕士及工程硕士（博士）这些工科特色培养项目的招生、教学等方面得到学校的进一步支持、信任和授权，从而可以放开手脚，大步流星向前跑。

据悉，计算机学院将引入竞争机制和科学长效发展机制，集中推进“三平台”建设，包括科研创新平台、产学研创新平台和学生培养创新平台。届时，研究生名额、政府企业合作项目、尖子生培养、场地、计算等资源都将统筹到平台中来，学院教师乃至全校教师都可以公开公平的竞争资源，能者先得，能者多得。

“学院当前的目标是发展到美国计算机院系第 50 名、60 名的水平。但长远的梦想，我希望能建造成像 MIT 计算机学科一样注重产业应用、社会影响力的国际顶尖计算机院系。”王晓阳如是说。

文/李莹

新起点 新展望

■ 图片新闻



10 月是全国“敬老月”，学校举办了系列敬老活动，并对我校 90 岁以上退休教职工逐一上门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图为 10 月 19 日，91 岁的倪定斋（右）向来看望的退管会工作人员展示自己的画作。文、摄/储懿

新任处级干部接受廉政教育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精神，切实加强我校新任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按照学校 2012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纪检监察部门近日对 5 月以来百名新任处级领导干部组织开展岗位廉政教育活动。

本次岗位廉政教育活动采取座谈会与自学两种方式进行。纪检监察部门于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举办了五场岗位廉政教育座谈会，安排了 46 位新任处级领导干部参加（其中 14 位为轮岗正处级干部，27 为新提拔正处级干部，5 位为副职重要岗位干部）。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建中同志参加了部分座谈会。

经济学院举办首届专业学位日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经济学院举行了首个“专业学位日”活动。我校于 2010 年首批获得金融硕士等 5 类经济类专业学位的培养资格。经济学院高度重视专业学位培养工作，在专业学位的学生培养方面全面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当天，复旦大学——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双学位项目正式启动。副校长陆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据介绍，该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将于 2013 年 9 月开始招生，首批招生人数为 20 人。

“专业学位论坛”经济学院专业学位实践基地授牌仪式、“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改革”主题沙龙等活动也于当天举行。文/仲倩

（上接第 1 版）负责上海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制定试点方案、实施细则，培养方案和质量保障体系。此外，由我校牵头，其他高校参与，开展了 4 个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临床医学教育研究课题，对于改革试点起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指导的重要作用。

在工作实践方面，我校也在进一步完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的招录、培养、学位授予等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注重“三个结合”，即研究生入学招生 and 住院医师招录相结合、研究生培养和住院医师培训相结合、学位授予标准与住院医师准入标准相结合。我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医院管理处均参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的日常管理工作，已逐步由“多头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升级”为有益于推进本项工作的良性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我校上

述部门在临床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协同创新”。

配合上海医疗资源布局调整

2011 年 5 月 7 日，我校附属华山医院北院项目新建工程主体结构在宝山区顾村镇正式封顶。在市政府实施的“5+3+1”医疗服务民生工程中，率先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今后更多的优秀临床医学人才将作为生力军，参与到华山北院的建设中。

自今年 2 月，我校附属金山医院由石化地区原址搬迁至金山新城正式启用以来，半年内门诊量已达 55 万人次，日均门诊量 4000 人次。这是“5+3+1”建设工程中最早开工、最早竣工和最早启用的医院。新院的成功启用，将吸引优秀临床医学人才，为上海实现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均衡发展的目标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也为其后将在郊区逐一启用的三级医院如何更好地服务当地居民提供了绝好的范本。文/何珂

2012 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刘源张的质量管理人生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倒是吃了一惊。我自认为只是个‘搬运工’，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去，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来。”这位谦逊的长者，正是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

自 1956 年参与中科院力学所运筹学研究室的工作起，五十多年来，刘源张始终专注于质量管理领域，长期深入一线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与应用的普及。他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费根堡终身成就奖的首个全球获得者。

倡导全面质量管理第一人

从最初的质量控制到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的系统思想，刘源张走过了不平凡的学术人生。

早在 1957 年，刘源张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1976 年 6 月，他主动要求到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工作。在厂里，他一边跟班劳动，一边开起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第一个讲习班。这段经历为他赢得了改革开放后科学界首个“全国劳模”称号。

之后，刘源张应邀到北京内燃机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帮助开展质量管理工作。著名的“三全”、“三保”理论就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所谓“三全”，

就是质量管理要考虑“全面质量”意义，进行“全过程控制”，并做到“全员参加”。所谓“三保”，就是用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量，用工序质量保证产品质量，用员工质量保证工作质量。这些理论对企业改进管理、提高生产率产生了极大影响。

提高质量标准要从娃娃抓起

多年来，刘源张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鉴定和推行。随着 GB/T19000-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CJ/B/Z 9000-9004-96《质量管理和质量理论的军用标准》和 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先后出台，中国的质量标准体系逐渐完善。但在刘源张看来，国内基础工业原材料的技术标准还远远不够。“我们不仅要提高技术标准的社会认知度，还要强调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的配合。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都是科学创新的结果，一定要通过科学试验。”

刘源张屡次上书中央，提出制定《质量振兴纲要》，提倡“建设质量强国”的口号。“要建设真正的质量强国，恐怕还要从娃娃抓起，在小学就开设质量课程。有了这种常识，自然就能形成消费者对企业的监督。”他还提议，质量教育的普及应从小学延伸到大学，同时大力宣传社会责任，提高消费者的质量意识。



甘为服务群众的“工厂大夫”

刚回国时，为了了解国情，刘源张到全国各地下工厂调研，没想到从此与工厂结缘，做了大半辈子的“工厂大夫”。推广质量管理方法时，他坚持用贴近群众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授。

1958 年，在北京国棉一厂期间，刘源张住在厂里，利用晚上时间和值班工人聊天。后来，他根据这段经历出版了《运筹学在纺织工业中的应用》，开创了中国运筹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先河。1963 年，在北京市纺织局组织的“质量控制讲习班”上，他还在国内首个采用模拟办法讲解质量特征的随机性和可控性。

在刘源张眼里，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群众不

能掌握学问，变不成力量，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一辈子的宗旨是为群众服务，而不是专家服务。”

五十多年来，刘源张先后下过两百多个工厂推广全面质量管理，深入三千多个工厂办讲习班，是名符其实的“工厂大夫”。“我有个工作三原则，第一要领会领导意图，第二要摸清群众情绪，第三要选用科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领导的思想问题、干部的本领技术问题和工人的问题。”

“学生满天下”

1977 年，刘源张第一个在国内媒体上作全面质量管理介绍和评论，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多次开办质量管理讲习班，1980 年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举办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首创先培养讲座辅导员再招收学员学习并进行结业考试的电视教学方法。

直到今天，87 岁的刘源张仍坚持每天七点钟起床，十一点半睡觉，每天工作五小时。今年初，他还随团考察了上海外高桥发电厂的质量管理情况。这位勤勉的老人说，要在自己质量管理人生的第六个十年里，做一名质量管理的社会活动家。“我想给企业敲敲边鼓，到企业里去讲诚信和感恩。”这是他心目中一份属于国家、属于质量工作者的责任。

文 / 卢晓璐

二〇一二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梁樑

管理学研究要『顶天立地』

不同的汽车 4S 店为什么会有巨大的利润差距？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投入是否发挥了最好的效益？绿色循环回收体系怎样才能成为增收节支的新“利器”？“这些问题很多都是组织效率分析要回答的问题。”2012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梁樑教授用形象的语言为记者简述了他的主要工作。

坚持学术研究

要面向国际前沿

2003 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启了梁樑的 DEA 研究之路。当时，美国沃切斯特理工学院李杰教授应邀到中科大访学，详细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研究 DEA 的历程和最新进展，梁樑从中

“听”出了 DEA 研究可能进一步开辟新领域和新方向。

长期以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 DEA)研究一直将决策单元看成一个个“黑箱”。梁樑认为，只分析这个“黑箱”外部的输入和输出，严重限制了 DEA 的研究内容和应用范围，提出能否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破解“黑箱”内部的奥秘。

之后，梁樑及其团队以供应链为切入点开展研究，引入非合作博弈理论和方法，将 DEA 最优效率分析转化为寻找博弈均衡的问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博弈 DEA 交叉效率”的概念，较好的解决了解的不唯一性——这一影响 DEA 在竞争性领域应用的主要理论障碍之一，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供应链系统的 DEA 效率分析模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黑箱”，为改善效率决策提供了方向性支持。近年来，梁樑共在 Oper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



中国情境与国家需要

2005 年，梁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对于基金委管理学部多年来倡导的中国管理学研究要“顶天立地”的提法，梁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管理学有三个重要使命：面向国际前沿、面向中国情境以及面向国家需要。面向国际前沿是他始终坚持的学术追求，实质上是做“顶天”的工作。但管理学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性和区域地方性特点，需要面向中国情境。还有一类国外垄断了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的研究，如能实现自主化，将为国家带来重大利益。后两类研究构成了他所理解的“立地”的实质。

梁樑常戏称自己是“操盘手”，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主持、参与和鼓励中科大管理学院的老师们开展面向中国情境和国家需要的研究与咨询项目。2010 年，安徽海汇金融集团邀请梁樑及其团队开展应收账款债权流转新模式的研究。据此研发了一种新的适用于中国的应收账款债权流转模式。以其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相关金融业务已于 2011 年起在天津滨海新区和安徽省先期试点，而应收账款债权交易和市场平台也由中国银行在部分地区试点。

实践是学术研究的灵感之源

尽管行政事务繁琐，但梁樑一直坚持不断找问题与团队成员和学生讨论，然后指导他们按一定路径去突破、解决问题。问题从哪里来？梁樑的回答是：一线实践。

指导学生时，梁樑会带着每个人具体地“走”一遍研究的全过程。说起导师梁樑，毕功兵至今依然难忘。“2003 年底，梁老师把我叫去，在管理学院寒冷的老楼里站着给我讲了 3 个小时，全面介绍了我今后要学习研究的新领域。”2011 年，梁樑指导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他也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回顾 20 多年的学术生涯，梁樑认为，管理学研究“顶天”难，“立地”更难，“顶天立地”是难上加难。但令他欣慰的是，得益于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 DEA 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而他们将在这条道路上奋力前行。

文 / 陶韩烁

2012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黄海军：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国庆高速免费？讨个节日彩头而已，到时一定拥堵至极啊。”2012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黄海军教授，在 9 月 26 日接受采访时曾这样预言。事实果真不然。

交通科学的魅力

黄海军，这位提倡“对拥堵路段实施收费以诱导需求分布、实现系统最优”的交通管理科学专家，从 1984 年起便开始研究交通问题，至今已有近 30 个年头。“我也没啥‘远大志向’，这辈子就待在北航研究交通了，这里是我的根。”

黄海军把一切可能的时间都投入到科研中，每晚 12 点到凌晨 3 点是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科研时间，白天只要一得空就看论文、想问题。“看 paper 真的会看上瘾，经典好论文会看上好多遍，几乎都能背下来了。”

1992 年，28 岁的黄海军在国际交通领域最权威的刊物《交通研究》上同期发表了 3 篇论文“运量分布与交通分配的多车种组合模型”、“交通分配与分布组合模型的改进算法”和“多车种组合模型的参数校正”(后二篇为与他人合作)，实属罕见。

截止目前，黄海军已在《交通研究》上发表了 23 篇论文，发表被 SCI 刊物收录的论文 130 多篇，被 SCI 刊物引用达 800 多次。去年，他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这是国内管理科学领域最高学术荣誉之一。作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目前他正主持《大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课题。

“看不透”的难题

早在 1995 年，黄海军就开始研究拥堵道路收费问题。黄海军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创新研究，发展并丰富了道路使用收费的有关理论与实践。他们用扎实的研究结果说明，只要收费站点分布恰当，收费时机掌握正确，收费水平设计科学，道路使用收费系统对缓解城市交通拥挤具有显著作用。黄海军还提出，“拥堵道路使用收费在中国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合理进行。很关键的一点是，必须保证收费收入的使用透明，并合理地弥补老百姓的损失。”

除了“拥堵道路使用收费模型与社会福利分析”研究成果外，黄海军关于“运量分布与交通分



配的多车种组合模型”、“动态交通分配模型和信息技术对交通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取得较大反响，其模型被国际著名交通软件借鉴，成为世界上多个城市与区域交通规划的重要参考文献。对此，黄海军谦虚地表示，“这些交通现象我都没看过，还要继续看。”

骨子里爱学术

2000 年，黄海军有幸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知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副手，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副主任。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仍然把编制留在北航，“骨子里还是想做学术。”

在基金委的四年，黄海军开拓了眼界，掌握了实践中系统管理的工作方法，最让他受益的是成思危的提点、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时年轻气盛，成老总会适时地给我很多警告，成老对学习生活的态度也影响了我很多。”

黄海军自称是一个“放养型”老师，认为导师要教给学生的主要是学术指引并为学生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他自己身体力行的钻研态度则成了学生们最好的榜样。博士生刘鹏说：“黄老师常常半夜 2、3 点给我们回邮件、批注论文，这种态度激励着我们自觉地去学习。”博士生赵传林则告诉记者，经黄老师修改的论文，“每一段都有红色的修改和批注，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修改一次收获非常大。”2006 年至今，黄海军指导的学生中已有 12 人获得博士学位。

黄海军致力于“解堵”，自己却从不开车。或许，“旁观者”的视角使他可以跳出驾驶者、管理者的思维去作研究。“这个事业没有诀窍也没有尽头。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没有最优只有更优。这就是我的追求。”

文 / 龚瀛琦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师生分享学习经历

90 分钟报告滴水未进 校长杨玉良会见并赠送画册

本报讯 10月16日下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受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复旦大学场论和粒子物理中心邀请,在光华楼东辅楼 202 报告厅,带来了一场名为“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的报告。报告会开始前,校长杨玉良会见了杨振宁,并向他赠送由校档案馆制作的《大师论道》画册。

此次报告会,主办方和学校宣传部合作,开通了校内网络直播,并将学生活动广场和光华楼东辅楼 102 室作为分会场进行现场转播。尽管如此,几个会场还是被复旦学子的排队长龙所包围。

报告会开始前,校长杨玉良会见了杨振宁,并向他赠送由校档案馆制作的《大师论道》画册。该画册收录了杨振宁与谷超豪当年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期间的往返信件、发表的论文抽印本、一起座谈交流研究的照片等共计 24 件珍贵档案资料。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凝结了杨振宁、谷超豪两位科学巨人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也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被誉为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

杨振宁回顾了青少年时期在北平崇德中学、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经历,以及日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JSA 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的情况,并分享了他的亲身体会和经历。

“直觉”是杨振宁在演讲中

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1937 年,战争让家人和杨振宁颠沛流离。杨振宁在高二就准备考试读大学,于是借了一本物理书籍在家里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

“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杨振宁说,“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时,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种时机,因为直觉不断被修正的过程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直觉会带领我们走向新的研究领域。”

“和同学讨论是极好深入学习的机会,同学之间应经常辩论,这对学习有莫大的好处。”

“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有道理,人们要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人有缺点也不要害怕,要敢于触碰未知的领域。”

“有好的想法,不要轻易放弃。”

……

杨振宁连续演讲 90 分钟,从始至终没有喝过一口水。因此,演讲全程没有丝毫停顿。在演讲最后,杨振宁鼓励青年学子要勇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把握机会,努力创造美好的明天。

文/崔梦玲

福建省委厅级干部到我校进修

本报讯 10月16日,福建省委党校第 41 期厅级干部进修在复旦大学网络学院培训中心开班报道。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游龙波教授带队,与 40 余位党校学员一起参加了培训。

本次进修为期四天,探讨了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之路,立足生态与转型需求的大背景,涵盖了城市规划、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等具体内容。培训形式以上课

为主,结合实地考察,使学员通过成功发展典型案例来深刻思考与掌握所研讨的理论主题。

福建省民族宗教与事务厅副厅长林致知是本期干部进修班的学习委员,他以三个字概括本次进修的收获:接、转、开,即接受知识、转化积累、开拓视野。他说:“听过几次课后,对有些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上午课上,朱勤老师从建筑规划角度谈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对我之前的观念是一个很强烈的冲击。”

文/王银香

研工部举办 2012 年 复旦大学优秀学生标兵答辩会

本报讯 11月15日,研工部举办 2012 年复旦大学优秀学生标兵(研究生)答辩会。经过之前的初评,25 名同学从 47 名申报者中脱颖而出,晋级终审答辩。来自研究生院、研工部、校团委、院系的领导和老师担任答辩会评委。

参加答辩会的同学以个人陈述为主,ppt 展示为辅,对取得

的成绩进行了翔实展示。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成绩优异,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工作中亦有所作为。评委们在点评中亦有所作为。评委们在点评中勉励同学们制定长远规划,坚定理想信念,在学业上再出佳绩,对学校和社会做出贡献。

经评审,20 位研究生荣获“2012 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文/李洁 陈熙



濮存昕邹红做客我校公共艺术课堂

本报讯 10月19日,团委学生艺术团公共艺术课堂第 15 课“剧社与大学生活”在光华楼开讲,这也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的活动之一。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理事邹红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的一课。从中国学生剧社的初创与发展谈到舞台艺术的魅力之源,从话剧艺术给学生的多方给养谈到艺术提供的人生境界。期间,濮存昕老师配合讲述的即兴表演给整场营造了几次小高潮,最后他借莱蒙托夫的诗歌,寄语同学们珍惜青春,面对自我,体悟艺术,享受生活。

文/崔璨 摄/牛佳敏

留学生回德讲述复旦留学经历 法兰克福孔子学院举办留学中国报告会

本报讯 10月4日,法兰克福孔子学院报告厅中座无虚席,掌声阵阵。一位笑容甜美的德国女孩,操着一口流利地道的汉语与嘉宾一起分享在复旦留学的见闻与心得。

这个德国女孩名叫 Lydia Englberger,她刚刚结束了在复旦国际交流学院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复旦大学是 Lydia 在中国留学的起点,提到在复旦的留学生活, Lydia 感触颇深地说:“这一年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提高了

我的汉语水平,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认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热爱汉语的朋友”。演讲之余, Lydia 还饶有兴味的与大家分享了许多她在复旦学习、在各地旅游时的照片和有关中国美食的心得体验。“这次在中国的留学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看到了一个与媒体报道和我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一个有着勤劳人民的美丽国家”。

Lydia 与复旦、与中国结缘于孔子学院每年例行的“三巡”

活动(巡讲、巡演、巡展)。2010 年,为了响应孔子学院的三巡任务,同时也为了配合世博会宣传工作,我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联合校艺教中心,在学校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协助下,率师生代表团赴德开展“三巡”活动。在法兰克福举办活动时, Lydia 恰好是当地孔院派来的随行翻译,她优秀的翻译水平、流利的汉语口语令我校团委老师们都赞叹不已,遂主动邀请 Lydia 来复旦国交院进修学习。

文/贺诗菁

“星动复旦” 第四届主持人大赛正式启动

本报讯 “星动复旦”第四届主持人大赛于 10月14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学生广场正式启动,此次比赛由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学生会艺术团主办,来自各个院系、跨越不同年级的学生与教职工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语言善辩与思维敏捷。

团委艺术团高天齐说:“这次比赛更注重培养的过程,希望每一个选手通过我们的活动都能得到提高,而不只是把关注点放在前三名身上,我们是培养型的比赛。”

选手中除了大一新生,也有即将离开学校的大四前辈甚至已经是参加工作多年的校友;有经验丰富的“明星主持”,亦有作为主持的璞玉新手。2012 级新生晚会的主持人刘逸飞也参加了本届大赛:“因为要做到更好

所以希望适当锻炼一下。”备受关注的大一外院双胞胎姐妹花孙雨朦和孙雨彤同台竞技,也双双进入复赛。

此次主持人大赛的筹划工作可谓下足了功夫:主办方设计和拍摄了小广告,清新的小短剧形式给比赛造势增色不少;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主办方举行了第四届主持人大赛主持前辈交流会,邀请到了复旦经验丰富的校园主持为参赛选手解答疑惑;在学生广场的初赛上,舞台布置更是别出心裁——选手的影子被灯光印在白幕上,评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主持词的展示过后,评委将点亮感兴趣的选手白幕上的灯,这样选手可以走出白幕与评委和观众见面进行自我介绍和之后的评委提问环节。

文/陈宇曦

NEWS 播报

● 今年 9 月底,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0 级本科生卞申达代表复旦大学参加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知识大赛,与台湾世新大学黄怡婷合作,夺得冠军。

● 今年暑期,台湾复旦中学首次举办复旦家族学生交流活动,邀请复旦基础教育联盟学校参加,共有四地(台湾、上海、重庆、乌江)六校参与。

● 在 10 月 6-7 日香港举行的 iGEM 亚洲区预选赛,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学生组织两支队伍参赛,分别获得亚洲区预选赛金奖和银奖。李一箫

● 10 月 15 日晚,国际知名画家、作家、演讲家刘楠与儿子刘轩在逸夫科技楼作了“坚持做自己:刘楠父子做客 3108 读书会”主题讲座。王蕾明

我校搭建病理转化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

病理研究所揭牌暨沪首届肿瘤病理高峰论坛在肿瘤医院举行

本报讯 10月12日,在我校附属肿瘤医院举行的纪念顾绥岳教授诞辰100周年暨首届上海肿瘤病理高峰论坛上,将致力于病理转化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复旦大学病理研究所”宣告成立。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发来贺信,市卫生局副局长瞿介明、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肿瘤医院院长郭小毛与刘彤华院士、顾健人院士为“复旦大学病理研究所”揭牌。该研究所所长、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杜祥主持会议。

病理诊断被称为诊断中的“金标准”,病理医师也被喻为“法官”,加强病理医师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杜祥教授说:“该研究所成立后,将发扬各附属医院专科特色以及病理亚专科优势,加强病理住院医师的培养,提高临床应用能力。同时,将在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以及各附属医院间加快亚专科平台的完善和联系,积极探索并形成

一套规范齐全的培养机制。”据了解,肿瘤医院病理科早在2007年就建立了10个亚专科,并在临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专家指出,病理诊断已经过去的形态诊断发展到“形态、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相结合”的综合诊断模式,病理诊断已不仅限于肿瘤的分类、分型,更与病人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预后评估相关。“我们发现恶性肿瘤在分子水平上具有高度异质性,身患同样的肿瘤,其分子遗传学改变不尽一致,最后导致患者治疗反应和预后的差别。因此尽快建立分子病理技术平台,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是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杜祥教授说:“以肿瘤医院为例,2011年分子病理检测例数超过4000,检测项目也每年增加,为精确的病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重要的诊断依据。”

杜祥教授表示,研究所今后将依托上海医学院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结合各附属医院的临

床标本和数据,聚焦高发恶性肿瘤,建立与治疗相关的分子分型模型,加快发现靶向治疗中的新靶点,尽快为一些目前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癌症患者,寻找到一条新的“生命通道”;研究所除了为治疗提供最为精确的诊断结果,还将力争建立恶性肿瘤易感基因谱和基因突变谱,构建肿瘤风险预警模型,寻找恶性肿瘤有价值的早期诊断标志物,通过验证应用于临床,为普通市民尽早发现肿瘤提供一种较为简易的检查项目。

据悉,顾绥岳教授是中国外科病理诊断的奠基人之一,亦是中比锶镭治疗院(肿瘤医院前身)病理科的创始人。肿瘤医院病理科目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也是上海市临床病理质量控制中心的挂靠单位。肿瘤医院2011年病理会诊例数达到24000余例,其中疑难病例超过会诊总量的一半,在全国首屈一指。

文 / 倪洪珍

我校三百多位专家“续谱”医学专著《实用内科学》第十四版将出版

本报讯 由我校陈灏珠院士、林果为教授和王吉耀教授任主编,潘孝彰教授任常务副主编,上海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300多位医学专家参与编写的我国《实用内科学》第14版日前完成总审,即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

1952年出版的《实用内科学》迄今已有60年,首版由原上海医学院内科一级教授林兆耆主编,一级教授钱惠、杨国亮等知名专家参与编写。《实用内科学》印数迄今已达100多万册,其中第13版分为上下两册,图文并茂,3035页,共680多万字,目前已印6万余册。

《实用内科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主编的内科大型

◎相关链接

我校于2010年2月成立第14版《实用内科学》编委会筹备组;2010年12月成立编委会,并启动编写工作;2011年12月开始收稿;2012年6月进行各

参考书,作者全部是上医及各附属医院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专家。该书文化大革命前已再版5次,十年动乱期间停止再版。从1983年起,该书终于走上正轨,每4年修订一次。由于该书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全国广大医务人员的欢迎,成为临床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的案头必备、必读书。

据了解,我国好几代临床医生都是读着《实用内科学》成长的,其中不少人从住院医师逐渐成长为著名医学专家。《实用内科学》一直被誉为了“中国的西塞内科学”。《西塞内(Cecil)内科学》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标准参考书,每4年1版,至2012年已出版24版。

个系统的分审;2012年10月完成总审。

此次总审得到了我校有关方面及中山、华山和市中五医院等资金的支持。

文 / 孙国根

儿科医院顺利完成三级甲等医院复评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三级儿童医院等级评审组对我校附属儿科医院进行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复评工作。启动仪式上,评审组组长刘国华和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签署了廉政承诺书。

在为期两天的现场评审中,儿科医院各部门接受了评审专家们的全面检查,并最终顺利完成了此次三甲医院复评。据悉,儿科医院秉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内涵”的指导方针,通过迎接此次评审,丰富内涵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不断促进医院各项工作的进步。同时,针对一些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改进。

文 / 张志豪

华山医院探索社区糖尿病防控新模式

本报讯 10月9日,由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我校附属华山医院内分泌科牵头的“静安区糖尿病‘三二一’管理项目”在华山医院静安分院正式启动。静安区副区长夏以群、华山医院副院长汪志明等参加了启动会。

该项目的“三”代表华山医院,“二”代表华山医院静安分院,“一”代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二一”管理项目将充分利用三级和二级医院的学术优势,把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治重心下沉到社区。该项目将在静安区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广糖尿病综合防控工作。

文 / 戴润明



日前,我校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举行“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应急演练。演练现场设置了五组观察员,以便通过演练更全面地发现问题不足、完善预案、优化流程。图为参与演练的医务人员对一名“疑似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进行隔离治疗。

摄影报道 / 张艳丽

肝衰竭产妇化险为夷母婴平安

本报讯 近日,经过我校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人员的及时抢救,患有严重肝衰竭的宁波籍产妇李女士平安产下女婴,她本人也化险为夷。

患有乙肝的李女士在怀孕35周时突感身体不适,便入住附近医院待产,一周后就出现了肝衰竭症状。李女士被火速转入公卫中心妇产科,病情十分危急,胎儿已出现缺氧症状。中心妇产科、重症ICU科、麻醉科、血库等多科专家立即进行会诊,制定手术抢救方案,并做好预防手术各类并发症的准备。

入院次日中午,剖腹产手术成功实施,李女士顺利产下一名

女婴。女婴因缺氧引发重度窒息,经初步救治后即被送往儿科医院进一步监护。李女士术后出现了肝性脑病、重度黄疸等肝衰竭并发症,同时还伴有肺部感染,陷入昏迷。

救治李女士期间,中心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对其进行24小时监护治疗,时刻观察病情发展态势,积极采取控制感染、抗肝性脑病、保肝、利尿等救治手段。李女士在昏迷一周后终于脱离险境,病情逐渐趋于稳定。

李女士苏醒后,在第一时间见到了度过危险期的女儿,全家人倍感欣慰。

文 / 范忞忞

微创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局麻条件下在皮肤上划出“绿豆”大小切口、采用椎间孔镜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实施髓核摘除术,术后患者即可下地活动——我校附属中山医院骨科近期成功开展了超微创经皮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为广大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带来福音,这也标志着中山医院微创脊柱外科已迈入国内“顶尖”行列。

该手术被医学界称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最微创、最温和的治疗手段”,从腰椎间盘突出包型突出到巨大髓核脱出游离于椎管内均可行椎间孔镜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较,椎间孔镜手术具有很多优势,如皮肤切口仅为5毫米,出血极少;局部麻醉,术中能与病人互动,不易伤及神经;后外侧入路,避免后路手术对硬膜囊和神经根的骚扰;椎间孔镜术后病人即可下地活动,康复快。

腰椎间盘突出症,俗称腰腿痛,是骨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退变、外伤等因素均可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引起下肢放射性疼痛。据统计,我国约有2亿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发病率达15.2%。过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行传统开放手术,腰背部正中入路,剥离椎旁肌后行椎板切除及髓核摘除术。该术式

创伤较大,而且会破坏脊柱稳定性。后来逐渐发展为椎间盘镜下髓核摘除术,但仍需切除部分椎板,同样会破坏椎间稳定性。

近年来美国、德国率先开展经皮椎间孔镜手术,通过椎间孔途径进入,内窥镜下直视操作,突出的髓核、纤维环、神经根、硬膜囊和增生的骨组织、后纵韧带、黄韧带等解剖结构层次清楚地呈现在屏幕上,安全性更高。特制的可曲性双极射频电极在术中可进行良好止血,消融粘连组织,使视野更加清晰;还可用来行纤维环成型,毁损椎间盘上致痛的末梢神经。该技术不咬除椎板,不破坏椎旁肌肉和韧带,对脊柱稳定性无影响,无需行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中山医院骨科除经皮椎间孔镜手术外,还先后开展椎间盘镜下髓核摘除、管道辅助下椎管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及经皮穿刺椎体成形、后凸成形、经皮椎弓根钉内固定等微创脊柱外科手术,并采用后路微小切口椎弓根钉技术加前路小切口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手术治疗脊柱结核、经皮椎弓根钉与椎体成形术加正中小切口减压治疗伴有神经压迫的转移性脊柱肿瘤、经皮椎弓根钉加正中小切口减压治疗黄韧带骨化症等。

文 / 顾宇彤

【学术】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 沈卫荣

193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讲述的是二战前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当飞机迫降在雪山丛中时，飞机上的四个人发现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雪山丛中有一个“蓝月谷”，一座巨大的宫殿坐落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了世界各路精英，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图书馆里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公布于世的杰作。

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下，《失落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成为西方白人的伊甸园，香格里拉的居住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而西藏人除了吃饭、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再也不会做什么了。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自己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

这几年，西藏及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关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当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会出现如此持久的“西藏热”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西藏，或者是他们虚



沈卫荣：

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著有《《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及研究》、《幻化网秘密藏续》、《幻化网秘密藏续释：光明藏》、《一世达赖喇嘛传》等，译有《西藏的贵族与政府》。

拟化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他们观念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令人渴望却已经遗失了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怀旧之情。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纵横驰骋，得到无穷的享受和满足。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热爱自己。

在西方，有关西藏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的传统。一是妖魔化西藏的传统，如性化和丑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

同时，西方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的传统，这就是他们把西藏和香格里拉划等号的一个重要原因。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让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至今很多政团认为，中国把西藏作为领土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黄金，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国领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就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找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希玛(Alexander Csoma, 1784—1842)，他到西藏就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

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所以现代藏学的产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

在西方真正把西藏炒得比较热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神智学会，创始人是俄国的布拉斯基夫人(Madam Blavasky)，她的名著是《西藏密法》，其崇拜者却遍布世界，神智学会发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和会员。

《西藏死亡书》的出版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这本书堪称西方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其作者亦是布拉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德。他曾在斯坦福大学人类学，也到了印度、西藏。

在西方的新时代运动中，“西藏神话”更是被广泛推行。新时代运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各种不同的精神运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个大杂烩。在表面的杂乱无章之下，贯穿的主题是对个人的颂扬和对现代性的圣化，即对个人自我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根本信仰和诸如自由、平等、真实、自我负责、自我依赖、自我决定等西方现代性几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肯定。与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运动对物质享乐主义的否定形成强烈对比，新时代人转而肯定物质享乐主义，寻求精神性和物质繁荣、宗教超越和资本主义商业成功之间的和谐结合，视物质的富裕为精神觉悟的一种成果。

这个运动对“西藏神话”的诞生有非常大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新时代

人不受任何一种固定的宗教传统的束缚。他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在精神超市里找到各种各样他所喜爱的宗教因素，包括藏传佛教，然后组成一种自己的信仰系统。

与此同时，密教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美国文化反动、性解放和性革命在精神和政治上寻求合法性的工具。直接、激进的密教受到上世纪60年代人的青睐，它给以暴力、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上世纪60年代赋予了精神和政治上的意义，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帮助。密教的传播，更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在西方的神话化。

综上所述，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整个西藏和藏传佛教被神话化了。西藏变成了一个理想中的“香格里拉”，藏传佛教成了西方人心中绝无仅有的精神指南，不仅能够满足个人世俗的喜悦，还能达到最终的精神解脱。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正是一部西方人的心灵史，是一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西藏的热爱，而是他们对所虚构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他们与现实西藏的交往。显而易见，只有除去这些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虚构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

(本文由文史研究院供稿)

【观点】

【来论】

分析社会病理的经济学与文学：从莫言说开去

经济学院副教授 王永钦

经济学与文学都是刻画人生和社会的；说得再准确一点，都是关于选择的，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社会选择。一个经济学者，如同一个作家，渴望他的作品能够刻画普遍的人性。由于个人的种种局限性(时间的局限性、空间的局限性、生活阅历的局限性)，要想刻画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谈何容易？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思考无非是两种，要么从里边向外看，要么从外边向内看；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既要从中边向外看，又要从外边向内看。

莫言主要是从里边向外看，即从他观察到的局部世界来刻画更普遍的人性与社会病理。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基本上都取材于他在老家山东高密县青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反映了中国底层大众在扭曲的社会机制下的挣扎和苦难，爱与恨，并且思考探索背后的社会机理。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小说有着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子；尽管在写作手法上，他往往大胆地采用夸张、隐喻的，甚至魔幻的方法来张扬某种现实的因素和某种内在的张力。著名的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也认为，莫言的写作风格是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例如最近的小说《生死疲劳》的叙事就穿越了1950年到200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涵盖了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再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7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与后来的开发。就像托尔斯坦的小说是理解近代俄罗斯的

一面镜子，莫言的小说也是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描述了社会的病理，那么经济学则要解释和揭示社会的病理。前者更加感性、描述性，后者则更加理性和分析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是社会机制的病理师和医生。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对社会病理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提出合理的“诊治”方法，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不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制度，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社会被分化成了不同的等级。种姓制度限制了人口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限制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但却在印度顽固地存在着。印度政府也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制定“平权法案”(规定某某职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其他种姓参与)等，来促进社会的融合，但收效甚微。最近的经济学研究发现，印度种姓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非正规制度是一种同种姓内部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互助保险机制；为了使得这种互助保险机制起作用，就要限制人们跨种姓的社会流动和空间的流动，否则这种互助保险机制就不能维持。在理解了种姓制度这种社会病理之后，就不难推出更对症的“药方”了：推进社会保险的改革，可能就会促进这种非正规制度的解体。

由于人性是类似的(尽管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中国的一些社会病理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分析。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性别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男女婴儿的比率是118:100，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性别失衡的解释是，性别失衡是由中国人的重男轻女这种文化传统造成的。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则发现，性别失衡主要还是由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喜欢生儿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儿防老；引入养老保险之后，这种偏向就下降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儿子与女儿成人后的经济收益。经济学研究发现，在那些养儿子的收益(成人男性的经济回报)更高的地区，性别失衡越严重；相反，在那些养女儿的经济收益(成人妇女的经济回报)更高的地区，性别失衡越轻。所以中国的性别失衡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经济现象。在理解了其社会病理之后，政策含义是不言而明的：推进社会保险和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会降低性别失衡，进而也会缓解甚至消除性别失衡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好的经济学研究和文学都是要反映更深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是西方的方法、东方的内容，或者东方的方法、西方的内容，都无关紧要——只要反映的主题思想是普遍的人性。最初，我们也习惯于从外向里看——拿着西方的模型来套中国的现象，但是慢慢地，更自信的我们会从里边向外看，将中国的某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发展成一个一般原理。中国在国际上成功的经济学家无不如此，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的灵感来自台湾土地改革的“反事实”，钱颖一的组织理论的启示来自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条条”和“块块”，他们的理论因为具有足够的普适性都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

网络化世界里要理解钓鱼岛问题，首先要理解钓鱼岛问题所涉及的相当庞杂的知识与问题网络，从整体、全面、系统的视角切入，避免局部、片面、碎片的理解。查阅网络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就能发现，最晚不迟于20世纪90年代，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已经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充分研究，从历史渊源与国际法两个层面构建了有关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坚定论述；大量古籍史料证实了海峡两岸基于“固有领土”路线对钓鱼岛提出的主权主张；以台湾张炎宪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剖析了日方“无主地先占”和“默认主权转让”两种所谓“国际法理”的依据，指出即使按照日方选择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法，也因为日方1895年对钓鱼岛实施的是极而不宣的“窃占”，完全不成比例的管借实效、以及在“无人岛”与“无主地”两者之间玩弄文字游戏，而流于无效。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证据与法理证据都已经得到充分论述与证明的前提，日本持续非法窃占钓鱼岛、非法实施国有化、继而还准备大肆向世界兜售期荒谬逻辑的背后，折射出决定钓鱼岛归属的并非民众一厢情愿的法理、事实亦或者是历史，而是赤裸裸的建立在权力政治基础上的大国博弈。日本目前持续非法窃占钓鱼岛的“理由”，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凭借自身实力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非历史，在亚太地区肆意重新划定战略防区界限，以及凭借一己之私，将中国的领土对日本私相授受所留下的恶果。身为超级大国，无法像好莱坞电影自己已售与鼓吹的那样平衡能力与责任，还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可以看作是钓鱼岛问题最终趋于爆发的关键：美国20世纪50年代乱画琉球边界，60年代末私相授受钓鱼岛给日本，又留下可供美国左右逢源的主权模糊地带，等到中国大陆力量崛起了又明里暗里地鼓励日本充当消耗品，这种长期存在的卑劣的超级大国权力游戏酿成了今日钓鱼岛的苦酒。

第三，必须认识到钓鱼岛最终解决方式与目前局势和中国综合实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而论，强调通过“国际法”来解决被日本看上的领土问题，似乎并不特别常见于中日之间。没记错的话，巴黎和会时期日本讨论过如何以体现国际法原则的方式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事情，918事变前后日本努力论述过在东三省应援助中国人建立伪满洲国的合法性问题；2012年名为泥鰌的野田首相也大谈解决领土争端的国际法问题；不得不让人唏嘘。显然今日的中国，有了足够在钓鱼岛彰显自身主权主张，维护合法权益的初步能力，但还没有树立清晰而无法被东京的鸵鸟政策否认的力量优势以及充分展现运用这种力量的政治意志，让石原和田野们彻底清醒过来。

一如那持续8年抗战期间的中日，今天围绕钓鱼岛展开的战略博弈，是新兴而持续崛起的中国，面对停滞而持续焦虑的日本及其不确定的盟友，所展开的一场持久战。一如当初日本入侵中国的种种事件，第一颗子弹永远是来自东京方向的，而最终的胜利必然需要各种复杂网络的支撑。理解钓鱼岛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为推进中国整体实力的深刻转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关心钓鱼岛以及中国的学子们参与此类战略博弈，贡献自身力量的有效途径。最终的胜利，有赖于从今天开始的各种努力。

网络化世界里的钓鱼岛问题

■ 沈卫荣 复旦大学讲师

2011 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系列之十

财政应“以人为本”

——访经济学院石磊教授

作为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石磊教授经常参加各级政府的决策咨询会议,为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地区发展规划研究。以他为首席专家的团队中标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并计划在4-5年的时间完成研究。

1978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的确立,中国迈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财政政策的重点也由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向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农业、轻工业成了财政补助的对象。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使得更多的资源集中到了工业领域,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客观上讲,发生这种倾斜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资源的均匀配置会导致无效配置。”石磊教授说道:“资源的增值能力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是不相等的。哪里的增值能力高,资源就自然地流向哪里。但是长期如此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衡,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全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最终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更是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民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得以提高。”因此,国家的财政政策除了应该为经济整体发展服务外,还应当考虑到“人”的因素。

“加大对基础民生的财政投入”

要在财政政策中体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加大财政在民生上的支出,尤其是基础民生上的支出。

石磊教授相当重视民生与基



石磊: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沪港发展研究所所长、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结构与政策、公共经济与政策、当代中国经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专著译著多部。

础民生的区别。在他看来,笼统讨论民生意义并不大。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将民生与基础民生加以区分,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急需的基础民生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基本就业以及商品、药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近几年来,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对基础民生的投入,但相对于人民的需求而言,仍是远远不够。

“这一点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就可以看出来,”石磊教授举例道,“中国目前城市化比率达到50%,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但是医疗资源配置显然没能达到城市与农村1:1的分配比例。”“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体制不健全,这些基础民生产品、服务的欠缺正是中国老百姓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不单单是文化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一旦出现突发疾病等状况,就有可能使老百姓出现资金严重短缺、周转不灵的情况。”

国家对民生投入的不足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最终也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增长决定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

和出口贸易。贸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刺激内需和投资需求。”很显然,一旦民生投入不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内部需求自然就减少。如此一来既限制了经济增长又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将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建立起以民生为价值导向的财政体系也成为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

“将民生指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当中”

加大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则存在制度上、实践上的困难。

一方面,民生支出与公共行政支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石磊教授的观察,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没什么变化,而公共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一直是增长的。“民生支出和公共行政支出两者实际上是在跷跷板的两边,一边开销多了,一边投入自然就少了。”

其次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制度给政府官员错误的行为导向。“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石磊教授十分注重制度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民生上的投资见效缓慢,大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严密的考核制度,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自然不

高,财政收入就很有可能流向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建立科学的干部问责制和考核制度,降低GDP考核在干部考核中的比重,增加民生在干部考核中的比重,尤其应当考察预算当中民生的投入,并且在决策的候核算预算落实的情况,将民生指标和干部问责制、干部考核制度结合起来。

“部分样本数据已经出炉”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笼统地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不同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根据石磊教授这一思想,课题组既挑选了以农业为主的地级市为样本,也选择了一些工业占比大的地区,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有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并计划根据不同发展类型的地区,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民生指标。目前,部分样本点的数据报告已经出炉,比如对山西晋城财政的研究报告。“我们的报告已经成为晋城市下一步财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石磊教授对此颇为自豪。

“国家要求我们强调理论方面的研究,每一年要出供国家咨询的研究报告,整个课题成果不少于5到6本的专著。”但是,石磊教授并不满足于国家要求的这些成果。目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连教学课本基本上都是翻译西方公共经济的教材。“把任何一个国家的理论放到中国,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石磊教授说:“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要做出理论上有突破的贡献。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以及政策服务。”

文/赵雨樱 王倩

鹿鸣 书榜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

王小甫
中华书局


该书研究了中国中古时期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和蒙古等周边族群的凝聚历程,分析了这些族群兴起的过程中,拜火教、本教、摩尼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等信仰的引入,成为建构本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族群凝聚。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李学勤
三联书店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史记》乃至“二十四史”的开端,记述了从黄帝至尧舜时期的远古历史。该书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五帝本纪》进行深度讲解,并系统梳理了有关五帝时代及上古史研究的争论与探索。

《郑泽庵:民国县长郑献微传奇》

(法)郑碧贤
三联书店


该书再现了民国时期一位深受传统文化、道德熏染的儒官,作为川北穷县三台县的县长,在任上两年半做成了造福一方、支持抗战的几件大事。作者为郑献微女,书中,她将自己的人生故事与追寻父亲足迹的过程相互交织,描绘了大时代背景下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图景,进而从一家两代人的道际折射出二十世纪国家兴亡、时代变迁的大历史。

《尚书后案》(上、下)

(清)王鸣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专力辑录、开发已失传的郑玄一家之学,郑注残阙者补以马融、王肃、孔安国和孔颖达之说,最后加以案语,可视作汉唐问《尚书》研究的集注和疏解。

《疏通知译史》

邹振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

范金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简帛》课题组 社科文献出版社

《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

王启涛 巴蜀出版社

《解读〈存在与时间〉》

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陈国灿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根据鹿鸣书店双周销售排行榜

文 / 干悦

兰克史学的主张



《世界历史的秘密》

作者:(德)列奥波德·冯·兰克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对思想家而言,历史不仅仅是实用的政治箴言集,而且是理解现实的钥匙。

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

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以倡导“如实直书”而著称,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历史叙述的风格是还原目击者所经历的一切。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东西方史学都有重大的影响。

19世纪是西方思想史上伟大变革时期之一。在这一世纪里,法国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冲击以及浪漫主义的盛行,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喷涌下的、而自17世纪以来却处于休眠状态的历史种子萌芽成长起来,欧洲人开始意识到今时不同往日,逐步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那些经验主义及哲学体系。整个欧洲逐渐意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和演变的。正是在这种

发展演变之中,事物的本质为人所认知。每一时代虽然都包含过去岁月所遗留下来的那些传统,但各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功业、价值以及特定的约束限制,并把各自时代所有的一切赠留给下一时代。

19世纪上半叶所有精神方面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地理学、进化生物学,还是法学、政治学、文学和神学等,都与不断滋长的、对过去的认知紧密相连,没有哪处不受历史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思想、科学变得历史化,历史变得科学化。借助古典哲学发展起来的批判技巧,历史学家在考证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历史学被提升到“科学女王”这样非同寻常的地位,历史研究也不再是退休的将军、政治家、古玩研究者的专属自留地了。历史学逐步专业化,历史学家

通常是由教授们来充当,历史学科也成为大学课程组成部分之一。对档案文献史料的精确考订取代了充满激情的想象,成为检验历史研究的试金石。在这种新思潮的驱使下,历史学科更加科学化。

如果说在欧洲这场精神革命中,德国处于中心地位的话;那么在德国,柏林大学列奥波德·冯·兰克教授则是德国这场精神革命的核心人物,即便是对相当挑剔的同时代的人而言,兰克也是这一精神革命的创始人,更是当之无愧的巨擘。

本书充分展现了兰克的史学批判方法和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兰克史学的政治性及兰克对史学本身及历史教学的思考与探索,是了解兰克及兰克史学的重要典籍。

文字辑录 / 何成



国行国驻

狮城小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坐落在新加坡西南边的一片丘陵上。因此,新国大的路颇有些山路的意味,校园交通主要依赖 shuttle bus。校内道路蜿蜒起伏,加之花花草草“大行其道”,许多路段只能容一辆大巴通过。这也让能驾驭着 shuttle bus 臃肿的车身而灵活穿梭于校园内的司机们成为我颇为敬佩的一群。

上下起伏的道路和独特的地理形势成就了车窗外的风景,我隔窗俯视依山而建的教学楼、泳池、球场亦尽收眼底。车内驾驶座边也有风景:迷你的星月旗、端坐莲花的菩萨像、各种摆饰、贴纸、照片……这些叔伯辈的司机们如同携着自己的小家前行在校园的景色里,上下的学生们许是他们最钟爱的访客。他们会静静等候远处奔来的孩子;会坚持到末班车,默默驶过一个空荡荡的车站只为停在最后一个路人旁;会在雨天把车绕个弯儿停靠在雨棚下;会在巴士会车时与同行点头挥手致意……那么多微凉的夜晚,我独自走向车站,远远望见暖黄色的车灯,便不自觉地扬了嘴角。

新国大每学期的课程量并不大,一般在5门左右,但课程要求不低,连讨论课和课后作业须煞费苦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份作业:给古代辞赋注释和以民国时期某名人身份创办一份杂志。

从辞赋作业说起。老师选了三十余篇很冷僻的辞赋,让我们从中任选一篇注释,包括文章的出处、来源、说明、作者传记资料来源及简

述、通篇注释等。被信息时代宠坏了的我们直奔互联网,然而从作者到篇章,能直接搜索到的资料少之又少,我的选篇甚至没有句读版本。这时我才明白老师布置作业时说的“有任何问题尽管及时来问”并不是象征性和习惯性的表达。此后,与老师的 email 联系不断,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少参考文献以及修正推进方向的指点,每周课前老师还会一一指导和解答大家遇到的难题。这样的学术体验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相较于给古代辞赋注释的严谨,创办一份杂志更具创造性,其难点在于需要尽可能地把握“创办者”的思想、意图并契合当时的时代。初步确定内容、分配文章后,小组成员各自拾起半文言的笔头,我的任务还包括以吕碧城的身份写创刊词。单人单间的寝室总是很安静,书桌前的窗子正对着西南方向,即便过了晚餐的钟点,红色的落日、橘色的晚霞还是那么悠悠地缀在海岸线上。忍不住抬头远远望去,许久才回过神,继续揣测着那位民国才女的心意,谨慎诚恐地落笔、铺陈

……整合文章、资料排版的那一晚,我们三人小组在寝室楼下的活动室一起忙碌到凌晨四点。那时我才知道零点后的学生公寓原来并不比白天冷清。通宵营业的小餐厅排着长队,公共活动区有三三两两聊天的,也有如我们一般埋头课题的。身体疲惫,睡意渐浓,可是大脑好像被某种弥漫的生机侵袭而叫嚣着要醒来。不禁想起了网上曾疯传一时的“凌晨三点的哈佛图书馆”照片,原来真的有如此勤学的场景。

后来,我们小组所办的杂志得到了“惊艳”的评价和 A 级评分。我们欣喜至极,笑得如释重负,觉得一切都那么值得。期末时,老师买了茶点在教室犒劳大家,同时交流作业成果。同学得意,老师欣慰,我看着被大家传阅的杂志,面对糕点,考虑着睡眠和精神满足哪个更奢侈的问题。

新加坡正如她的别称狮城一般,具有百兽之王的气度。在这里,华裔、印度裔、马来裔三大种族以及各种宗教文化,以一种让人啧啧称奇的形式和谐并存于市。车水马龙一侧,冷不丁地就会看到一座哥特

式教堂,一方亲切的道教小庙,一片香烟袅袅的佛堂,一顶寂静的伊斯兰清真寺……多民族多宗教的新加坡因此三天两头地迎来各族节日庆典,造就了丰富的文化盛宴。

早年的移民聚居区留下了现在的“唐人街”、“小印度”,还有一些遗留着娘惹文化的小街。中国红红火火地过新年时,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也格外地热闹。我被裹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前行,街旁摊贩叫卖着只有幼年时在乡下集市上看到过的各种散装零食,虽然其中很多我都说不出名称,但依旧亲切得让人感动。最传统的新年风俗在异国得到了回归和继承,我的心头不禁五味杂陈。

新加坡的风情绝不是一言两语就能道明的。圣陶沙、鱼尾狮那些旅游景点自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去称赞,而我更愿意逗留在新国大教室旁的小花园里看看虞美人,在街道图书馆里看趴在地上做功课的小学生,在海边沙滩上跟卖饮料的老奶奶聊天,在树林里欣赏青年人迎着烧烤的炊烟弹唱吉他…… 文/朱霞

诗情画意

歌诗达·维多利亚轮

巨厦浪涛矗羊城,
漂洋过海歌排鲸。
八方言语江湖梦,
万国衣衫旅客情。
早沐晨风观旭日,
晚薰夕照醉繁星。
华都仙境多巡过,
乐曲悠扬千港停。

作/何佩刚

朝花夕拾

九月九

在中国,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古书中屡见记载。

早在先秦的《吕氏春秋》就有记载:“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飭。”即在九月初九的丰收之际要举行祭天祭祖的活动。

到了汉代,《西京杂记》有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重阳节别称“老人节”,有求寿之俗,据说便源于汉代。《荆楚岁时记》也印证了这一习俗:“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

除宴饮外,赏菊也是重阳节的重大习俗。重阳节前后恰逢菊花绽放之时,因此重阳节在古时还有“菊花节”之称。这一天,人们不仅赏菊,还常常将菊花、茱萸戴在头上、身上。因为茱萸有“辟邪翁”的雅号,而菊花则又名“延寿客”,正契合重阳节辟邪与延寿的寓意。重阳节佩戴茱萸和菊花的习俗也流传至今。

登高也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之一。早在《晋书》中便有大司马恒温重阳节登高的记载。而民间的登高习俗,最初是为了避邪除灾,后来才渐渐带有游乐的性质,如《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榼,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文/叶轻驰



尼亚加拉大瀑布

董西侠 摄

健康提示

秋季多食梨

梨在古时既被推崇为“百果之宗”,现代人则誉其为“天然矿泉水”。目前市面上的梨具有绿、黄、白、棕等多种颜色,香气怡人,凉脆可口,不仅营养丰富,还有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的功效,特别适合秋天食用。

梨的含水量多,所含糖分高,且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等可溶性糖,并含有多钟有机酸,故味甘微酸,汁多爽口,能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润肺止咳,对急性气管炎和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缓解咽喉干痒痛、音哑、咳嗽、痰稠、便秘、尿赤等均有良效。

梨还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作用,因为梨中含有较多的配糖体和鞣酸成分以及多种维生素。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头晕目眩、心悸耳鸣时不妨吃点梨。肝炎、肝硬化患者常吃梨则能起到保肝、助消化、增食欲的作用。

不过梨性寒,多吃会伤脾胃,尤其是脾胃虚寒、血虚者不可多吃,最好能煮熟或做成羹汤吃。由于梨有利尿作用,夜尿频者睡前应少吃。此外,梨不可与鹅、螃蟹、西红柿同食,以防引起腹泻。

大多数人习惯将梨洗净生吃,但天冷时生吃性寒的梨,容易使人更感体寒,因此不妨将梨煮熟了吃。炖煮过的梨寒性大为减弱,其中所含的不可溶纤维被加热后很容易被人体消化,润肺止咳的功效也更好。

文/盛之韵

各抒己见

复旦的第一个章程

1905年9月,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乃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开辟了中国私立大学的先河,由此开始了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全新探索。

私立复旦,何以自立?目睹亲历了各类大学在中国的移植、运作和结局,马相伯深刻地意识到,不可学洋务学堂、官办学堂,“中体西用”只能学得制夷之技,亦不可学教会大学,培养“才”却不培养“人”;大学最根本的是制度性建设,故需“西学体用”,全面学习西方大学制度;大学乃学术之重镇,人格培养之广场也。故《复旦公学章程》(1905)开宗明义,称其办学意在“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

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培有用之人才”。在此,学术研究和人格培养代替了狭隘的“学而优则仕”,成为复旦之目的。

复旦一反中国重文轻理的传统,引入大量西方理科学科,诸如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心理、动物、植物等,全面研究西方学术;为学术研究之深入、透彻,特设外语教学方式,用西文教材,以西文授课,其外文亦不限于英文,另有法文、德文以及古典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显示出其对学术研究的决心以及对科学路径的追寻。

对于“东亚病夫”这一时代耻辱和“教育救国”的时代呼唤,复旦尤重大学人格培养之功能。重视国文,每月考试得作文一二篇,有意唾弃国学者,“虽录取亦随时屏斥”,从母语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重视体育,规定每日体操,有教员监督、计分,强化学生身体素质;出于对中国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的政治大势判断,“其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每周辟固定时间训练学生演说能力;另定公学徽章,“拟用金制黄玫瑰,以明黄人爱国之义”等。

复旦自创立之初,就从章程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气概和广阔的视野,从根基上落实大学学术研究之首要功能,因处风雨飘摇的时代,故格外重视大学之人格培养与救国责任功能。又因私立性质,可较好地独立于政治之外,自由地追求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当时,国内各类大学章程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残留着不同程度的“中体西用”的痕迹,而《复旦公学章程》独树一帜,立足于清晰的大学理念,全面地学习西方大学制度,走在了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时代前列。

文/吴云香